

复杂系统视角下的举国体制进路： 系统解析与案例比较

操友根,任声策,杜梅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举国体制作为攻克重大领域关键难题的复杂系统,是现阶段中国应对外部竞争加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保障。基于复杂系统及管理理论,从“顶层设计—贯彻执行”二分维度构建举国体制解析系统。顶层设计子系统由目标与决策元素构成,而贯彻执行子系统元素包括任务、主体、资源、动员及协调机制。系统内及子系统间各要素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促进举国体制重大成就的取得。进一步,根据举国体制系统解析框架,对航天、扶贫、防疫、体育举国体制进行纵深分析及跨领域比较发现,各领域解析系统元素具有的共性是确保举国体制成功的前提,而异质性则对不同领域举国体制运行绩效的差异起到解释作用。从系统解构视角研究打开举国体制的内核,丰富已有文献对举国体制概念、特征、模式等外部“轮廓型”的研究,促进学界对举国体制认识的深化与统一。

关键词:举国体制;复杂系统;解析系统;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1.2;D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3(S)041

Research on the new-type system of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case comparison

CAO Yougen, REN Shengce, DU Me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As a complex system to overcome key problems in major fields, the new-type system of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China to cope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xternal competition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is stage. Based on complex system and management theory, a new-type system of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dichotomous dimension of “top-level design-implementation”. The top-level design subsystem is composed of goal and decision, 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subsystem consists of tasks, subjects, resources, mobi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 elements within the system and among the subsystems interact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promoting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the new-type system of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Further, according to that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cross-field comparison of aerospace, poverty alleviati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sports found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the elements of the analytical system in various fields is the premise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new-type system of

收稿日期:2023-07-31 修回日期:2023-12-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212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2120210242)。

作者简介:操友根(1992—),男,安徽怀宁人,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生、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与创新管理。通信作者:杜梅。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while the heterogeneity can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at system in different field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deconstruction opens up the core of the new-type system of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supplement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models and other external “contours” studies, and promot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type system of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Key words: the new-type system of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complex system; systematic analysis; case analysis

举国体制是在特定领域汇聚全国优势力量集中攻关,实现国家意志的非常规制度安排^[1],在中国具有相当悠久且成功的实践基础,包括从推动中国取得“两弹一艇一星”重大科技突破、完成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目标,到助力中国实现“新冠抗疫战”基本胜利。历史经验证明,举国体制是中国应对特殊时期和完成特殊任务的最优体制^[2]。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崛起趋势与外部遏制压力之间矛盾加剧,且中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面对挑战最大、任务最艰巨的关键使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①”这表明举国体制再次成为新时代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的重要法宝。因此,立足新国情,深入研究举国体制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文献来看,学术界对举国体制展开了相对丰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举国体制的应用领域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依据举国体制的应用领域,已有研究主要分为“体育竞技举国体制”^[3-6]、“科技举国体制”^[7-10]以及“防疫举国体制”^[1,11-13]等。根据举国体制的研究内容,已有研究重点探讨举国体制的概念内涵^[2,8]、基本特征^[6,10]、落地模式^[8]、实现机制^[7,9]、优化路径^[4,7]等。尤其是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首次提出“新型举国体制”概念以来,引起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详细论述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嬗变的时代背景^[14]、历史与实践逻辑^[15-16]、应用场

景^[14,16-17]等。纵观以往研究,主要呈现3个特点:第一,已有研究主要从外部视角勾勒举国体制的轮廓,虽有利于促进学界对举国体制的总体认识,但对其内核构成及运转系统知之甚少;第二,已有研究过于聚焦对新型举国体制中“新型”含义的解读,而回避阐释“举国体制”的真正内涵,使该概念迄今尚未被清晰讨论,并引起误解和争议^[2];第三,已有研究缺乏对关键领域举国体制的实践证据进行系统化分析及比较性研究^[15],而经验比较研究能够识别出优秀做法与存在问题从而推动举国体制的优化完善。这些不足为本文从内部机制层面和经验比较方法上拓展现有研究提供了思路。

综上所述,鉴于依赖举国体制完成的任务往往呈现出复杂性、跨系统交叉特征,本文拟基于复杂系统视角深入剖析举国体制,从“顶层设计—贯彻执行”二分维度构建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区分工程技术复杂系统与社会复杂系统任务,分别对航天、扶贫、防疫、体育领域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进行分析评估,进而比较4个领域举国体制解析系统的共性与差异,从中提炼出可指导实践发展的经验启示,旨在提升中国未来关键领域中举国体制的运行效率,加速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历程。

一、文献综述

根据对举国体制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研究呈现出紧追国情、逐步演化、纵深推进的趋势,即探讨焦点从关键领域(如体育、扶贫、防疫、科技)的传统举国体制转向新型举国体制。因此,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 (2020-11-03)[2022-07-06].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本文着重回顾体育、防疫和科技领域举国体制研究现状,进而介绍新型举国体制研究进展,并评述整体研究格局,指明研究差距,阐明本文研究思路。

(1) 体育、防疫、科技领域举国体制研究现状。第一,关于体育举国体制,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体育举国体制的本土特征^[6]和国外经验^[5]、举国体制对中国竞技体育事业、体育人才培养的影响机制和效果^[4]。第二,关于防疫举国体制,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制度优势分析其对抗击疫情^[11]、疫苗研发^[1]和复工复产^[13]的推动作用,并提出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背景下应按照生态政治模式来建构生态型新型举国体制^[12]。第三,关于科技举国体制,深受学界关注,重点从内涵、模式、机制、路径等方面展开研究。在内涵方面,雷丽芳等^[8]从广义和狭义视角阐释科技举国体制,指出其具有“计划性”“举国”“政府主导”等特点,以及国家和项目两个层次的内涵特征。在模式方面,闫瑞峰^[18]对国外举国体制的研究发现,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实践应用存在三大模式,分别为以美国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为代表的国家全面主导模式,以欧洲伽利略计划为代表的公私合营模式和以日本和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为代表的公私联盟模式。在机制方面,李哲等^[9]从项目决策、项目责任、研发组织、利益分配、预算与成本控制、绩效评价、进入与退出、政策激励等方面提出实施举国体制应关注的制度框架。在路径方面,刘戒骄等^[7]认为中国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创建发展和改革开放后的适应性调整,基本完成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2) 新型举国体制研究进展。自2015年新型举国体制概念首次被提出后,学界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涉及概念辨析、特征探寻、历史溯源、实践路径等。从概念内涵看,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是在中国传统举国体制实践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新世情、社情、国情、党情做出的创新性标定^[19]。新型举国体制的“新”表现为集中方式的市场化、力量组成的现

代化以及大事范围的可扩展化^[20]。从基本特征看,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适应性转型,在领导力量和价值取向方面,二者一脉相承;在资源配置、参与主体和外部环境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则呈现市场化、多元化和开放化等鲜明特征^[14]。从历史演变看,从“举国体制”转向“新型举国体制”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无论是“政策演进”“国家建构”抑或是“现实危机”的视角,都清晰呈现“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的嬗变历程^[15]。从实践路径看,实施新型举国体制应结合具体情况,实现放权模式下的央地互动、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以及统筹格局下的利益协调,保障其制度优势不被削减^[20]。同时,要控制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范围,防止泛滥化,并建立好退出机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17]。

基于文献梳理与分析可知,举国体制的研究概况已初步呈现,研究议题在逐渐扩展、丰富,但尚需从以下4个方面加以深化。第一,总体而言,理论界对举国体制的关注和挖掘仍相对较少,以此为主题的文章发表较为缺乏,表明举国体制存在进一步探索空间^[15]。第二,已有研究多从概念、特征、流变、模式、路径等维度开展研究,回答举国体制“是什么”类的问题,使学界对举国体制的宏观把握相对深刻,但缺乏对举国体制内部构造及运行系统的解析,难以解释举国体制“如何”类的问题。第三,从关键领域的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目前研究过于强调从时代背景对其“新型”的解读,而回避对“举国体制”问题实质的阐释,使得该概念尚未被清晰讨论,并引起误解和争议^[2]。第四,经验分析是规范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构成,有利于识别存在的问题,明确优秀实践做法。现有研究尚未对关键领域举国体制的国内外实践证据进行系统化分析与比较性研究^[15],难以真正掌握各领域举国体制成功的共性与差异。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复杂系统为视角深入举国体制内部,构建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并系统性研究航天、扶贫、防疫、体育领域举国体制解析系统的共性与差异,从而推动举国体制相关研究的深化。

二、复杂系统视角下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构建

(一)复杂系统视角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分析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调整系统结构,优化要素关系,使系统整体达到最优^[21]。根据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即子系统数量和种类、子系统之间关联关系的复杂程度(非线性、不确定性、模糊性等)以及层次结构,可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与复杂系统^[22]。区别于具有微观可还原性的简单系统,复杂系统是具有非线性相干作用的开放系统^[23]。随着复杂性科学发展,复杂系统视角在科技管理领域被广泛应用^[24-25]。

举国体制是以举国之力完成国家关键核心领域的重大难题,因而它是一套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管理系统,其本身是一个由众多具有共同目标、功能互补、资源匹配的行政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协会组织等联结在一起的巨大系统。根据系统论的内涵界定,举国体制具有主体复杂、要素复杂、层次复杂、关系复杂等特点,是典型的内容多、要素多和层次多的复杂系统,是在多个要素相互影响和促进下所形成的综合系统。因此,举国体制完全符合复杂系统的特征,引入复杂系统视角解析其内核构成具有理论依据。

(二)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构建

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构建基于复杂系统、管理理论推导与实践案例归纳相结合。第一,从系统论看,举国体制是完成重大任务的复杂巨系统,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向要素、结构和功能更加复杂的方向演进,并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26]。根据该定义,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应包括主体与要素、功能与目标、结构与边界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二,从管理学基本职能看,举国体制也是一套解决复杂问题的管理系统,是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功能,对各要素(人、财、物、信息、时间、技术等)进行管理,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27]。按照这一内涵,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应涉及目标、决策,主体、资源、协调、控制等,并从目标与决策形成转向以主体、资源、协调、控制等为核心

的执行过程。第三,根据对航天、扶贫、防疫、体育等举国体制实践考察发现,举国体制存在跨层次(央地)、跨区域、跨系统特征,并强调动员工作,以利于集聚全国之力。综上所述,举国体制管理体系主要由顶层设计和贯彻执行两个子系统构成,如图1所示。决策子系统由长期目标和最高决策体系构成,实施子系统主要由任务特征、主体构成、资源需求、动员机制和协调机制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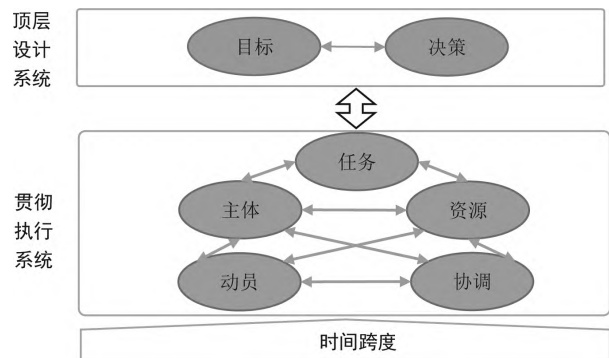


图1 举国体制解析系统

顶层设计子系统的核心功能是根据对形势的总体判断明确未来一段时间内应致力于完成的关键使命,其核心是目标和决策。目标居于顶层设计子系统的核心,并可区分为远景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目标具有两大特征:①蕴含国家意志。国家意志强度体现出国家层面对目标的重视程度,从而决定其被实现的可能性,通常表现为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明确希望和国家文件的愿景陈述。②突显明确性,强调动态差距及反馈。目标清晰程度反映出对追求结果及其路径的深思熟虑,进而影响其被执行的效率。同时,目标实现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要求及时平衡目标与现实差距,并通过反馈调整机制缩小差距。决策是顶层设计子系统的另一重要元素,通过决策子系统可将目标落实到执行层面,但其落实力度主要取决于决策机构的等级,如国家级、部委级等。决策机构层级越高,权威性越大、覆盖面越广。目标和决策对贯彻执行有决定性影响。

贯彻执行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决策机构所明确的目标转化为任务,在动员机制与协调机制支撑下,通过主体组织及参与、资源投入等过程,

促进任务付诸实践以取得预期成就。在元素构成上,贯彻执行子系统包括任务、主体、资源、动员及协同机制五部分。就具体贯彻执行过程而言,第一,任务体系。举国体制的任务体系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为工程技术复杂系统问题与社会复杂系统问题。系统问题的性质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可分解程度、并行工程数量多少及难度大小等。第二,参与主体。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企事业、协会组织、社会大众等均为可能的参与主体,其中牵头主体发挥主要作用,同时,主体侧重有偏市场化与偏行政化两类。参与主体广泛程度、认知一致性,对促进各任务的有序完成有重要影响。此外,应保障参与主体的权责利匹配。第三,资源体系。资源体系需要保持稳定性与持续性。重大任务完成必定离不开人、财、物的长期支持,对于科技创新尤其需要战略科学家,其他类任务也需要各行各业领军人才等。而在新科技革命时代,科技力量、信息资源对把控任务进度、提升任务质量等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动员体系。举国体制参与主体广泛,需要用好动员机

制。可以从3个方面把握:①动员对象,既要激励各类组织承担任务,也要鼓励个体参与,提高参与主体的数量与多样性;②动员逻辑,正面可从物质收益或精神财富出发进行动员,负面则可从现实困境或潜在损失规避进行驱动;③动员方式,主要依靠政治动员、公共宣传方式,必要时可采取战时状态、平战结合方式,降低动员难度。第五,协调机制。举国体制运用领域任务多且复杂、主体广且类型各异,需良好的协调机制。既应妥当平衡好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还要解决好跨部门、跨区域、跨层次协同的问题。协调主体越多、协调范围越广,协调难度越大。

除此之外,举国体制需注意时间要素。重大任务的完成,离不开顶层设计子系统与贯彻执行子系统的持续良好运转,其时间跨度可能是长期(10年以上)或中期(5~10年),极少情况是短期的。时间极其考验目标、决策,发生重大改变可能导致中途放弃、半途而废,需要警惕。举国体制解析子系统、构成要素及关键要点如表1所示。

表1 举国体制解析子系统、构成要素及关键要点

子系统	构成要素	关键要点	时间周期
顶层设计	目标	目标类型:远景目标/阶段目标 目标特性:①国家意志;②明确程度;③动态差距	短期标定+长期坚持
	决策	决策机构:国家级/部委级 决策特性:①权威性;②覆盖面	
贯彻执行	任务	任务类型:工程技术复杂系统问题/社会复杂系统问题 任务特性:①可分解性;②并行工程数量;③难易程度	
	主体	主体类型: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协会组织/社会大众 主体特性:①牵头主体属性;②市场化程度;③主体广泛性;④权责利匹配	
	资源	资源类型:人、财、物、信息 资源特性:①来源;②投入稳定性;③投入持续性	
	动员	动员对象:各类组织/社会大众(注意数量与多样性) 动员逻辑:成本收益比较/风险规避 动员方式:政治动员/公共宣传/战时状态、平战结合 动员机制特性:①动员主体差异;②动员范围;③动员难易度	
	协调	协调对象: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协会组织/社会大众 协调机制特性:①协调牵头主体属性;②市场化协调程度;③协调主体差异; ④协调层次、系统及范围	

三、关键领域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在短时间内实现“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突破。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民生工程和应急管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这都依赖于举国体制的制度性优势^[14]。丰富且成功的举国体制实践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样本。因

此,遵循前文构建的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对航天、扶贫、防疫及体育领域的举国体制进行系统性评估。

(一) 航天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中国航天事业起源于“两弹一星”事业的举国体制。自1956年起至今已66年,中国从零起步独立自主发展成为航天强国,成为自立自强的典范。

钱学森在1956年初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中国导弹与火箭事业发展计划。获得支持后，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1958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式组建；1964年，导弹、原子弹先后研制成功；1965年，正式启动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1968年，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兼任院长；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首颗自主研发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送上太空；2003年，“神舟”五号将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升空并安全着陆月球表面，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实现在地外天体软着陆的国家；2022年，中国空间站进入全面建造阶段。可见，中国航天事业突飞猛进，在运载系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诸多工程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纵观中国航天事业66年发展历程，举国体制主要有以下特征。

(1) 顶层设计子系统方面。第一，目标特征。中国航天事业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为初心，以发展尖端国防技术的国家意志为基础，以“两弹一星”为初期明确目标，并不断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分阶段部署明确目标，逐渐迈向航天强国目标。第二，决策特征。中国航天事业决策首先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决心的体现，并成立专门最高决策机构，先是1956年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后是1962年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其主任为周恩来，成员有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和张爱萍等七位部长级干部。这一最高决策机构是行政权力机构，可以组织协调、调动全国资源。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会体制延续下来，直至周恩来逝世后的1979年。虽然在“两弹一星”时代后中央专委会不复存在，但是中国航天事业一直得到国家领导人支持，顶层决策机构发挥重要影响。

(2) 贯彻执行子系统方面。第一，任务特征。中国航天事业的任务目标非常明确，是以任务带动科技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分解复杂任务结构和关键工程技术问题。运载火箭、卫星发射、

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每个阶段总体任务明确，任务攻关的核心在于工程技术协调攻关。第二，主体特征。首先成立专门的科技攻关机构，在1965年正式启动人造卫星研制任务后，1968年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当时，国家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和企业根据国家计划分工协作。进入90年代后，航天事业逐渐走向市场。第三，资源特征。完成航天事业首要的基础是科技人才。早期，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在其中发挥显著作用，一方面坚定国家意志，另一方面贡献科技智慧，为解决复杂系统工程做出有益探索。后期，大批人才不断培养，专业人才不断涌现，保障了人才资源需求。随着航天技术的民用化，与市场资本的纽带不断加强。第四，动员机制特征。早期的动员机制主要发挥国家建设初期大众爱国热情、奉献精神，争取广泛支持。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转型后，虽动员机制需要调整，但中国航天事业的势头已经形成，基础已然筑牢，顺利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且随着航天市场化发展，有越来越多市场资本参与进来。第五，协调机制特征。“两弹一星”时期的中央专委会在总体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早期主要通过行政计划方式协同各类资源，保障航天事业基础得以巩固^[2]。后期，中国航天核心机构累积雄厚基础并与市场有效融合，市场化协调机制作用显现。此外，在时间跨度上，运载火箭、卫星发射、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每个阶段任务完成均耗时10余年。

综上所述，中国航天事业是在66年不懈坚持中实现从0到1、由弱到强的。国家意志、高层权力机构、动员协调、战略人才、长期坚持是中国航天举国体制顺应时代不断取得成功的保障。

(二) 扶贫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史，就是一部扶贫攻坚史。尤其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得益于扶贫攻坚领域的举国体制。秉承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扶贫济困的政治初心，1986年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由副总理任组长，这成

为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制度化开端。同时,出台一系列重要战略纲要及指导文件,包括1984年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年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2011年继续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2013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并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十三五”规划纲要将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变为国家意志和可操作的规划;党的十九大将精准脱贫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和底线任务;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脱贫作为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基于以上最高决策机构领导和国家战略支撑,2012年,中国基本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2020年,中国实现消除全部贫困人口的重要目标,成为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2022年,中国扶贫战略的主要目标将从数量型的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目标转向高质量扶贫。由上可见,中国扶贫事业发展迅速,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纵观新中国成立73年来脱贫攻坚工作历程,举国体制主要有以下特征。

(1)顶层设计子系统方面。第一,目标特征。中国扶贫事业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终极目标,并根据国情分解总体目标为阶段性目标,从消除饥饿的早期目标,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除全部贫困人口的重要目标,以及逐渐部署高质量脱贫攻坚阶段目标,各阶段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决定性目标。第二,决策特征。中国扶贫事业是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扶贫济困政治初心的一脉传承,并通过设立国家层面的决策及执行机构使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变为国家意志和可操作的规划。1986年成立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是首个扶贫工作专门议事机构,由副总理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党、政、群团、国企等方面负责人,30多年来始终以中央小组高位协调推动扶贫工作有序、有效展开,并将目标落实到地方政府。

(2)贯彻执行子系统方面。第一,任务特征。

扶贫任务是消除贫困、实现小康,要通过各种途径给各类贫困人群增加收入。由于扶贫对象差异大,任务复杂。中国先后历经区域开发、扶贫攻坚、整村推进、精准扶贫等发展过程^[28],全面消除贫困的无死角任务难度大,需要联系到基层的每一户。第二,主体特征。中国扶贫事业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统一规划与部署下,参与主体由早期政府扶贫发展为十八大以来的政府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29],逐步提升市场、公众在扶贫工作中的主体地位,集聚多方力量。企业、事业单位等通过结对子等方式广泛参与进来。可见扶贫工作参与主体极其广泛。第三,资源特征。扶贫既需要充足物资和资金,又需要大量管理者。物资和资金需调动当地、社会和市场力量。自精准脱贫实施以来,已形成中央统筹、省市负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29],因此,扶贫工作质量的立足点在于基层治理水平。早期区域扶贫工作中涌现出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在因地制宜带领区域富裕方面发挥出先进模范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出,还需充分挖掘和培养乡村领头羊、用好干部,提升他们的治理能力,激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的内在活力。第四,动员机制特征。中国扶贫事业由政府主导,早期主要通过政治动员模式增强全党全社会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通过“扶贫军令状”,层层传递扶贫工作压力,形成扶贫倒逼机制。同时,借助正反双向激励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广泛的社会互助机制,将扶贫触角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第五,协调机制特征。早期扶贫工作由各部委、省市等各自推进。20世纪80年代后,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为专设议事协调机构,以强大的政治协调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在中国脱贫攻坚工作中始终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从上向下统领到基层乡村,扶贫任务深入到各系统各级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量主体参与协同,主要依靠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组织协调力量实现的。此外,在时间跨度上,中国扶贫事业中完成消除饥饿、解决温饱、消除全

部贫困等每个阶段任务平均耗时 20 余年。

综上所述,中国扶贫事业的成就是在 73 年不懈坚持中实现。国家意志、高层权力机构、政治动员、广泛参与、多主体协调、无死角落实、长期坚持是中国扶贫领域举国体制顺应时代不断取得成功的保障。

(三)防疫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2020 年初,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突然袭来的疫情,中国果断决策、快速响应,采取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用 10 天左右时间分别建成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用一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多月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 3 个月左右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用不到一年时间成功研发出新冠灭活疫苗。2021 年,中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 28 亿剂次,且已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1 亿剂新冠病毒疫苗;同时,中国经济交出全年增长 8.1% 的优异成绩单。2022 年 3 月起,新冠奥密克戎病毒又在上海传播,在坚决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下,3 个月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中国能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抗疫战果,得益于国家应对重大灾难的顶层设计,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益于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

综观 2020 年初以来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历程,举国体制主要有以下特征。

(1) 顶层设计子系统方面。第一,目标特征。中国防疫工作目标的总体遵循是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阶段目标清晰,实行精准施策,因地、因时、因人调整防控目标,从早期把防控工作作为最重要工作来抓,到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坚持中央“动态清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方针坚定不移。第二,决策特征。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党中央迅速成立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准战时”的领

导指挥体系和因时因势制度的战略策略,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坚强领导、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同时,国务院成立联防联控机制,其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多部委协调工作机制平台,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交通部、教育部等 32 个成员单位,为迅速集结物资资源、防护设备、医务人员、科研力量等提供机制保障。

(2) 贯彻执行子系统方面。第一,任务特征。疫情传播防控、医疗救治和科学研究构成抗疫阶段的主要任务,具有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特征。防疫任务涉及到区域的每一个人,必须严密落实到每个社区、楼宇、个人,工作量大,且大量保供任务、应急事务接踵而来,是实实在在的全面运动,难度极大。第二,主体特征。党中央成立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成立联防联控机制,总体主抓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其他各方力量快速整合,企业迅速转产复产,供给口罩、防护衣、呼吸机、消毒用品等紧缺医疗诊治和防护物资,而高校、科研院所等则牵头或参与检测试剂、疫苗及抗体研发、药物治疗等疫情防控科研项目攻关。社区、公众是执行防疫的基层核心主体。第三,资源特征。打赢防疫战的重要支撑力量在于人、财、物和信息,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免费测试和疫苗注射,投入大量人员协调基层疫情防控治理,信息甄别传递争分夺秒。防治疫情需要科研攻关人才和应急管理型人才^[30]。科研攻关人才在快速甄别病原体,研发检测试剂、疫苗及抗体药物等方面取得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应急管理人才则在实施网格化负责、地毯式排查、封闭式管理、全方位宣传等方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助力国家防疫大局。第四,动员机制特征。中国防疫的动员机制首先源于政治任务,在服从中央统一决策与部署下,通过压实属地责任,开展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处理队伍建设,推动防控资源和防控力量下沉,切实提高决策与执行效率。而随着防疫工作推进,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等力量得以激发,共同参与防控工作,并以严格规定要求各主体承担各自角色。第五,协调机制特征。由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坐镇,对疫

情防控进行统一指挥、统一决策、统一部署,并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一协调,调动军队、中央各部委、各地方政府集结一切医疗物资资源、防护设备、医务人员、科研力量毫无保留、最迅捷地到达疫情重点地区,最大力度地治疗患者,最大范围阻断疫情扩散和跨区域传播。此外,在时间跨度上,中国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从快速切断疫情传播、控制日新增病例至个位数、成功研发新冠疫苗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的各个阶段性任务。

综上所述,中国防疫工作的成就是在中央统一指挥和科学精准决策施策中实现的。国家意志、高层权力机构、科技与应急型人才支撑、政治动员、多主体协作是中国防疫领域举国体制顺应时代不断取得成功的保障。

(四)体育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圆满落幕,新中国体育事业经过73年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起到重要作用,但“三大球”依然考验着体育举国体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获得9金4银2铜共15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三位,取得中国从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而20年前的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中国才获得第一枚金牌。2021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上,中国共获得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位居第二,追平在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自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夏季奥运会获得第一枚金牌以来,中国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以51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举世瞩目。举国体制是公认取得竞技体育巨大成就的原因。但是,对比女排五连冠、女足获得奥运会、世界杯亚军,男足2002年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男篮2001年终结美国46连胜纪录等成就,20年来,中国男足、男篮等项目似乎并未从体育举国体制中取得成功。

纵观新中国竞技体育事业73年发展历程,其举国体制主要有以下特征。

(1)顶层设计子系统方面。第一,目标特征。中国竞技体育目标明确,即在国际大赛特别是奥运会中获得更多奖牌、金牌。1979年国际奥委会

恢复我国合法席位,1984年中国获得第一块奥运会金牌后,邓小平曾说过,“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它鼓舞了这么多人,要把体育搞起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把奥运金牌放在战略位置上,即奥运战略^[31]。1995年原国家体委发布《奥运争光计划》。200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制定新时期奥运争光计划”,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在奥运会等世界大赛获奖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的需要。第二,决策特征。中国体育管理决策机构主要来自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1952年,中国仿效苏联开始设立国家体委,各级政府设有专门分管体育的领导,并有专项经费。当前已形成县、市、省、国家体委“四级政府”,县、市、省、全国和奥运会“五级竞赛体系”,少儿、青年、国家队“三级训练网络”的体制^[32]。

(2)贯彻执行子系统方面。第一,任务特征。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任务特征明确,以各项目世界冠军为榜样,选拔、培养运动员、组织比赛。各项目根据项目特征单独开展这套工作,但对运动员选拔、训练的技术水平在逐渐积累。竞技体育的任务是依赖人的身体来实现,与科技攻关任务主要依靠人的智力来实现不同。另外,竞技体育任务有个体、团队两种类型,其人才选拔、培养模式存在差异。第二,主体特征。国际体育大赛获奖需要运动员、教练、管理机构等共同参与。其中,运动员和教练员是首要主体,体育局和各项目体育协会发挥组织作用,政府投入资金。而随着体育社会化、市场化发展,社会资金和资源投入也在增多。第三,资源特征。竞技体育首要资源是人才,即优秀运动员和优秀教练员;其次提升竞技水平需要资金投入,包括各级运动队资源配置,训练装备和分析设备等。第四,动员机制特征。每个人都会对从事专项运动的收益和代价进行权衡。竞技体育的动员机制主要是为国争光精神激励,以及获得成功后的各类收益。收益含有形和无形,物质收益、退役工作等均是重要考量因素。成本则是投入训练、牺牲学习时间,进而影响职业

选择机会。在体育社会化和市场化转型后,足球、篮球联赛运动员的可观收益激励作用强,但是较低水平的联赛带来的高收入则限制人才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可能。第五,协调机制特征。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主要协调部门,行政协同的条块清晰,社会和市场参与者配合度较高。此外,在时间跨度上,运动员的培养需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培养、训练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长达10余年,并且长期参与训练,很大可能需要与普通教育体系分离。

综上所述,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成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达到顶峰。目标明确、各级重视、多数项目动员协调力量大、资源保障是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不断取得成功的保障。但是,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并非无往不胜,以中国男足为例,虽改革不断,社会资金大量投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却至今仍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四、关键领域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比较

基于前文对航天、扶贫、防疫和体育举国体制实施效果和解析系统的评估结果,进一步对四大关键领域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进行比较(如表2所示),并分别按照共性与差异进行归纳,总结如下。

(一)关键领域举国体制共性分析

根据跨领域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比较可知,共性是各领域举国体制运用成功的前提,主要表现为:从顶层设计子系统来看,一方面,各领域举国体制具有明确的追求目标,并体现出强大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决策机构等级高,基本以国家层面的领导机构为主,并拥有跨系统协调能力。

从贯彻执行子系统来看,第一,任务均反映出复杂系统工程特征。第二,参与主体广泛,涵盖从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第三,涉及资源广泛。人才资源是核心资源,尤其需要领军人才,如钱学森之于航天,钟南山之于防疫,张桂梅之于教育扶贫,李宁之于体育。第四,动员逻辑主要基于物质、精神收益与成本比较或出于损失规避。第五,早期行政协调居多,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协调作用上升。最后,所有任务的实现均依赖于长

期坚持。

(二)关键领域举国体制差异分析

根据跨领域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比较发现,异质性是不同领域举国体制运转绩效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所在,主要包括:在顶层设计子系统方面,一方面,目标的明确性有差异,航天、扶贫领域目标高度清晰,而体育领域目标较为模糊,如奥运奖牌、足球名次,而防疫领域中疫苗研发目标也较为模糊;另一方面,决策机构等级略有差异,大部分是国家级机构,但体育决策层次相对较低,仅为部级(除足球有部际联席会议外)。

在贯彻执行子系统层面,第一,任务类型差异大,有工程技术复杂系统问题和社会复杂系统问题之分,而且任务可分解程度不同,各领域冲突交织也不同。第二,主要执行主体有区别,航天领域以科研单位和市场主体为主,防疫领域以行政机构、医疗部门和市场主体为主,扶贫是行政、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普遍参与,而体育则以行政事业部门为主。同时,各主体参与阶段与参与程度也有区别,早期大多以行政机构为主导,后期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增多。第三,各领域对人才资源的素质要求不同。航天领域需要专业人才,防疫、扶贫领域需要基层治理人才、志愿者队伍,体育尤其足球领域需要高水平的球员梯队储备。第四,各领域动员对象差异大,动员难度相异。在具体动员方式上,存在从政治动员、公共宣传到平战结合等,早期政治动员效果好有利于后期市场动员的成功。但需注意的是,足球领域的动员逻辑存在问题,即极其可观的物质收益激励与较低水平的联赛成绩使运动员向高水平发展受限,并影响该领域高潜力人才集聚。第五,协调机制主体与协调范围存在较大区别。协调主体前期多以行政为主导,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需要市场力量的协调,但各领域市场参与协调的时间有早晚之差。同时,航天、体育主要在各自系统内协调,而防疫、扶贫涉及跨系统,协调范围更广。最后,各领域举国体制任务的时间周期不同。防控领域主要是短期任务,对疫情爆发地区采取战时状态,而其他领域则属于长期任务。

表2 关键领域举国体制比较

	航天	扶贫	防疫		竞技体育	
			防控	防治	个体	团体
目标	目标:运载火箭,发射卫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登月)等 特征:明确,国家意志强	目标:全面消除贫困 特征:明确,国家意志强	目标:动态清零,查明源头,切断传播 特征:明确,国家意志强	目标:研制疫苗 药物 特征:较为模糊,国家意志强	目标:国际奖牌、突破历史 特征:较为模糊,国家意志强	目标:国际奖牌、突破历史 特征:较为模糊,国家意志较强
决策	国家级(中央专委会) 权威性高、覆盖面广	国家级(扶贫办) 权威性高、覆盖面广	国家级(中央领导小组) 权威性高、覆盖面广	同前 权威性高、覆盖面广	部级(体育总局) 权威性较低、纵向覆盖面广	同前,足球有部际联席会议; 权威性较低、覆盖面较小
任务	工程技术复杂系统任务,并行任务多,难度偏大	社会复杂系统,并行任务多,难度中	社会复杂系统,并行任务多,难度大	技术开发系统任务,并行任务中,难度大	技术系统任务,并行任务中,难度适中	技术系统任务,并行任务多、难分解,难度大
主体	科研机构为主,较多产业内企业较多	政府为主 市场、社会广泛参与	政府和医疗机构为主 市场、社会广泛参与	医疗、科研机构为主 市场参与	各项目选拔培养组织、市场机构	同前
资源	人才:人才队伍不断加强,战略科学家; 资金:财政投入长期保障	人才:基层治理人才 资源:财政为主,市场、社会为辅	人才:基层治理人才、志愿者队伍 资金:财政为主	人才:行业领军人才、医疗攻关人才 资源:财政和市场	人才:个体运动员梯队,教练员等 资金:财政和社会	同前 足球领域高水平运动员储备不足
动员	对象:参与主体、人才 逻辑:精神、物质收益; 方式:政治、宣传	对象:参与主体、人才 逻辑:精神、物质收益; 方式:政治、宣传	对象:所有人和组织 逻辑:损失回避 方式:政治、平战结合	对象:参与主体、人才 逻辑:物质收益 方式:政治、宣传	对象:参与主体、人才; 逻辑:精神、物质收益; 方式:系统内、公共媒介	同前,动员储备人才队伍难,动员逻辑存在矛盾
协调	前期行政协调多,后期市场协调多,系统内协调范围广泛	以行政协调为主,系统内外协调范围极广泛	以行政协调为主,系统内外协调范围极广泛	早期以行政协调为主,后期转向市场,系统内协调范围广泛	多数项目行政协调为主,系统内协调范围不大	同前 足球行政和市场协调多,系统内协调范围广泛
时间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短期(封控)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举国体制在攻克关键领域重大任务过程中发挥出巨大的制度性优势,助力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两弹一艇一星”、竞技体育、扶贫、防疫等重大成就。“十四五”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加剧的国外遏制压力,同时,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中国更需要在重大战略领域持续、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以取得重大发展,从而促进这一阶段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完成。

当前,鉴于各界对举国体制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并存在争议和误解,甚至根据字面意义将举国体制等同于“计划体制”^[2]。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可能原因在于对举国体制的探究尚未触及里核,如果从内部视角剖析举国体制的构成将有利于缓解这一困境,并深化对举国体制的认识。因此,本文基于复杂系统及管理理论,构建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并对航天、扶贫、防疫和体育举国体制进行系统评估和比较分析。

第一,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构建遵循“顶层设计—贯彻执行”二分维度。其中,顶层设计子系统由目标和决策元素构成,贯彻执行子系统由任务、主体、资源、动员机制及协调机制五个元素构成。子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同时,两个子系统之间也相互影响,并在时间演化下,使举国体制系统整体功能达到最优,取得预期成效。第二,根据对4个关键领域举国体制实施效果及解析系统的比较分析发现,共性是各领域举国体制运用成功的前提,而异质性是不同领域举国体制运转绩效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顶层设计子系统从根本上决定举国体制任务完成的预期效果,尤其是目标是否可以明确转化可分解的任务、决策等级是否具备调动各方支持任务实施的权力威信和范围。而贯彻执行子系统内的任务类别、执行主体地位、人才素质、动员对象、协调范围则影响举国体制任务完成的速度和质量。通常,任务可分解程度高、执行主体力量强大、战略领军人才及各类专业人才储备充足、动员对象认知一致、系统内外协调充分,举国体制实施越有成效。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举国体制作为管理复杂系统的科学机制,被应用于诸多领域。因此,大量与举国体制相关的研究议题值得并亟待学界探索,但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尚不对称,存在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象^[14]。本文尝试从复杂系统视角解析举国体制,推动并丰富现有关于举国体制的研究。二是,尽管举国体制研究初具规模,基于概念、特征、演化、实施等维度的分析促进学界对其总体性认识,但现有文献较少聚焦于举国体制内部,对其系统构成的理解仍处于“黑匣”状态。本文遵循复杂系统及其管理理论,构建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展现出举国体制作为任务体制,从决策形成到决策实施的过程运转系统,并从4个关键领域举国体制实施效果及解析系统的比较分析中,进一步明晰举国体制的强大性和重要性,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举国体制的研究视角,深化举国体制的研究内容。

(三)实践启示

立足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和中华民族复兴胜利在望的关键阶段,举国体制的制度价值和独特优势将更加突显,世情、社情、国情、党情必将要求举国体制在涉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应妥善处理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总体来看,重大任务日益呈现出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特征,表明举国体制从决策形成到贯彻执行必将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攻关过程,因此,坚定政治初心、决心,坚持战略方向、执行方案,持之以恒地推进是举国体制取得重大发展的唯一路径。同时,要警惕中途放弃、改弦易辙等短期主义行为。

第二,早期阶段,如何启动举国体制,并确保其成效。本文基于“顶层设计—贯彻执行”二分维度构建的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关键领域举国体制的决策始于国家领导层的强烈政治决心和国家战略文件的明确愿景表述,而中央层级的行政机构设立是保障决策有效落地的前

提。同时,在贯彻执行中,要根据任务是工程技术复杂系统问题还是社会复杂系统问题,从主体、资源、动员和协调等方面进行配置保障决策实施的顺畅。

第三,后期阶段,如何根据实践需要,革新举国体制。本文对航天、扶贫、防疫及体育领域举国体制的共、异性比较结果可以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基于系统演化视角对航天、扶贫、防疫、体育举国体制实践过程分析发现,举国体制的革新主要表现为任务类型的复杂交叉性、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协调机制的市场化、资源获取的开放化等,但根据战略领域属性及基础不同,举国体制转向多元化、市场化及开放化的进程有所不同。早期,由于某一领域或行业基础薄弱、发展落后,举国体制更多依赖政府的行政权力驱动。但当该领域或行业形成相对较强的市场化力量时,举国体制则需适时革新转型,即应结合重大任务完成度和市场成熟度探索新模式促进举国体制从以行政为主导的举国体制向以市场发挥核心功能的举国体制嬗变。

第四,举国体制作为任务体制,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因此,在举国体制系统运转过程中,如何做好动态监控、风险预警、及时优化极其关键。本文提出的举国体制解析系统也可作为评价系统对各领域举国体制运行绩效进行跟踪、评估,以便为目标及执行体系调整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思路。如通过对体育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分析发现,中国男足似乎并未从这种体制中获益。按照举国体制系统解析维度,可从男足的任务特征挖掘原因。不同于个体竞技体育,男足作为团队型运动,需要一批优秀的足球个体运动员,这要求其动员机制能够源源不断的激励并培养优秀运动员,但高水平人才供需市场未充分形成。因此,促进足球举国体制优化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动员机制的能效,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驱动更多青少年从事足球事业,提高运动员储备数量;二是,增强现有运动员冲击世界名次的动力,从而以“明星”效应吸引更多高潜力个体加入,提升储备运动员质量。

参考文献:

- [1]胡颖廉. 举国协同: 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解释: 以新冠疫苗研发为例[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 25(6): 84-91.
- [2]路风, 何鹏宇. 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 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 管理世界, 2021, 37(7): 1-18.
- [3]刘志国, 吕志君, 闫士展.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自信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6): 71-79.
- [4]鲍明晓. 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新机制[J]. 体育科学, 2018, 38(10): 3-11.
- [5]孙高峰, 刘宏亮. 英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特征及其启示[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6(2): 129-136.
- [6]郝勤. 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 特点与功能[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4, 30(1): 7-11.
- [7]刘戒骄, 方莹莹, 王文娜. 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 实践逻辑与关键要义[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5): 89-101.
- [8]雷丽芳, 潜伟, 吕科伟. 科技举国体制的内涵与模式[J]. 科学学研究, 2020, 38(11): 1921-1927, 2096.
- [9]李哲, 苏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4, 30(2): 5-10.
- [10]钟书华. 论科技举国体制[J]. 科学学研究, 2009, 27(12): 1785-1792.
- [11]宋道雷. 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有为社会: 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视角[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4(2): 177-184.
- [12]胡锐军. 国家治理的生态型新型举国体制转向与建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38(4): 5-17.
- [13]王亚华, 陈相凝. 新型举国体制下协调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难题的中国经验[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 25(6): 74-83.
- [14]谢宜泽, 胡鞍钢. 新型举国体制: 时代背景、基本特征与适用领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38(4): 18-26.
- [15]包伟杰. 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 历史与逻辑[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 44(5): 104-110.
- [16]陈劲, 阳镇, 朱子钦. 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落地模式与应用场景[J]. 改革, 2021, 34(5): 1-17.
- [17]曾宪奎.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新型举国体制探索[J]. 宁夏社会科学, 2022, 41(2): 89-96.
- [18]闫瑞峰. 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 理论, 经验与实践[J]. 经济学家, 2022, 6(6): 68-77.
- [19]曹睿卓, 董贵成. 新型举国体制: 概念、内涵与实现机制[J]. 科学社会主义, 2021, 38(4): 83-90.
- [20]刘锦, 汪进元. 论新型举国体制的宪法基础与实施路径[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 38(6): 63-70.
- [21]魏宏森, 曾国屏. 系统论: 系统科学哲学[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 [22]QIAN X S, YU J Y, DAI R W. A new discipline of science: the study of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and its methodology [J]. Journal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1993, 4(2): 2-12.
- [23]AUYANG S Y. Foundations of complex-system theories: in economics,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statistical physics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4]饶扬德, 王学军. 复杂科学管理视角: 企业创新机理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05, 21(6): 37-41.
- [25]毛凯军, 田敏, 许庆瑞.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企业集群进化动力研究[J]. 科研管理, 2004, 25(4): 110-115.
- [26]TANSLEY A G. The use and abuse of vegeta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J]. Ecology, 1935, 16(3): 284-307.
- [27]周三多. 管理学: 原理与方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8.
- [28]孙久文, 夏添. 中国扶贫战略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 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35(10): 98-113.
- [29]张腾, 蓝志勇, 秦强. 中国改革四十年的扶贫成就与未来的新挑战[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 15(4): 101-112, 154.
- [30]黄瑶, 王铭. 新型举国体制对防控新冠疫情的制度优势[J]. 理论探讨, 2021, 38(2): 167-172.
- [31]戴敬东. 中国体育体制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0, 33(1): 10-14, 117.
- [32]戴永冠, 许斌. 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人本思想的思考[J]. 体育学刊, 2009, 16(3): 19-22.